

中国近代社会科学家

朱士嘉自传



我叫朱士嘉，字蓉江，1905年8月15日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县塘头镇樊七桥朱巷。

从1920年起，因我父亲去世，家庭经济困难，无力继续上学。在这种情况下，姐夫王尔成资助我考进江阴励实中学读书，后升入燕京大学，获学士学位（1928年）和硕士学位（1932年）。老师的热忱辅导，循循善诱，加快我学习的速度。《中国地方志综录》（以下简称《综录》）就是在老师的亲切关怀指导下编写出版的（1935年）。1930年至1937年，我参加了禹贡学会和地理学会，并在该会所编《禹贡半月刊》和《地学杂志》上发表了十几篇关于地方志的文章，又给我以锻炼写作的机会，为今后继续研究地方志打下基础。这个时期，我历任辅仁大学讲师和燕京大学图书馆中文编目部主任，并主编《史学年报》和《燕大图书馆报》。

《综录》的出版，不但引起我国史地学界的重视，也引起美国国会图书馆（以下简称“美图”）的注意。该馆藏有大量地方志，

需要整理编目、1939年9月该馆东方部恒慕义主任函托燕大教授洪煊莲介绍我到美国国会图书馆去工作。我在该馆工作三年(1939年至1942年),编写了《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地方志目录》,1942年出版,著录二千九百多部。中国地方志是“美图”东方部特藏之一。另有包括《永乐大典》在内的明清古籍和大量报章杂志,有些是从日本中国古旧书店搞到的,内有珍本,值得复制。

1940年春,我参观了美国国家档案馆(以下简称“美档”)举办的展览会,发现该馆藏有《道光皇帝给美国总统泰勒书》。当时我就问招待员:“还有其他中文档案吗?”回答:“不知道”。我不信,遂向恒慕义反映情况,并托他从“美档”搞到一张阅览证。过几天,该馆所藏《美国驻广州领事馆报告》找到了。逐页翻阅,好家伙,触目惊心的拐骗华工的中文档案一件一件呈现在眼前。于是,继续搜集中文档案的决心增加了。三年之内,我利用业余时间——大约一千多个小时:从三百多册档案中找到并复制了一千多页中美关系档案资料胶卷(1956年让给中国历史博物馆)。我考虑到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已找到的只是中文档案资料,还有大量外文档案资料也都是研究近代史、世界史和帝国主义侵华史所必需参考的第一手资料,如能把它全部复制带回祖国,供历史研究工作者参考,多么理想。这时(约1945年)前北平图书馆负责人袁同礼正来美国考察,道出纽约,我见到他就立刻向他建议到“美档”去摄制胶卷三百多卷;约十五万页。1949年解放后,这部分胶卷由北京图书馆接管。

1942年9月,我离开“美图”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继续深造。1946年获博士学位。这个时期,我曾主编“哥大”的中国留学生刊物《新潮》。这个刊物除报导“美档”所藏中外档案情况外,还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贪污腐化造成通货膨胀,给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罪行。

1946年6月，我在美国密西根大学暑期学校讲学。曾在一次公开演说时控诉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

1946年7月至12月，我在“美档”学习档案管理法，但并未放松对于中美关系档案资料的搜集。值得纪念的是：《美国驻广州领事馆报告》第一册（1790年）以及反映延安大生产运动的木刻版画十几张（胶卷，其中一部分为《鲁艺术刻选》所未收），就是“美档”照相部在这个时期送给我的。另有荷兰人所著《档案学》（英译本）、“美档”出版物以及有关欧洲各国档案馆历史资料，已于1954年托请吴晗送给我国国家档案局。

1947年至1950年7月，我在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远东系教书，职称是副教授。该校接受我的建议，也从“美档”搞到中美关系档案资料三百多卷（胶卷），个别研究生已开始进行整理。我在西雅图认识一位耶鲁大学毕业生名叫Griffin的，写过《领事和飞船》（Consuls and Clippers）。这部书引用了大量外文档案资料，可与“美档”所藏档案互相印证，实为研究中美关系史者不可缺少的参考书；关于贩卖华工的罪恶活动，也在这部书里如实地反映出来。

我在美国加入了美国远东学会、美国地方志学会和美国档案工作者协会。1948年，我在美国远东学会年会上宣读了论文《美国国家档案馆所藏中文档案》，后在《美国远东季刊》上发表。至于留美期间我所写过的其他著作，请参考附录：《著述简目》。

1950年春，美国著名作家斯特朗从首都北京来到美国西雅图，公开发表演说，热情地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革命的伟大胜利，给我上了一次极为深刻的阶级教育课。我很受感动，主动要求她给予个别谈话的机会。她老人家那么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立刻接受我的要求；在一家咖啡馆里边吃点心、边谈话，进一步启发帮助我了解新中国的建设成就。她语重心长地对我说：

“中国革命形势大好，需要海外留学生回去参加革命，贡献力量”。我之所以毅然决然辞去华盛顿大学的教职，接受武汉大学的聘请，返回祖国，是和斯特朗的忠告分不开的，也是和周甦生的介绍，陶孟和的支持和个别地下党员的帮助分不开的。

1950年7月，我冲破了美国政府和英国领事馆设置的重重障碍，离开西雅图，经旧金山，乘“威尔逊”号邮船到达香港，返回广州。当我第一次见到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的时候，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流落海外十一年之久的孤儿终于胜利地回到祖国怀抱参加建设，是多么值得纪念的事情啊！

1950年9月至1953年7月，我在武汉大学历史系教书，职称是教授。1951年兼任武汉大学图书馆馆长。

在抗美援朝运动中，我和其他归国不久的留学生一起，在武昌花园山大会上分别控诉了美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我所搞到的一部分美帝侵华档案资料也在武大图书馆和汉口民众乐园展出，深受群众欢迎。在运动中，我进一步提高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觉悟。

后来，我在湖北英山参加土改，倾听贫下中农对地主阶级的血泪控诉，使我受到生动而深刻的阶级教育；思想感情从此逐步转移到劳动人民这方面来。

1952年，我在武大加入“民盟”组织。

1953年8月，经李达校长批准，我从武大调到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以下简称“历史三所”，今近代史所）工作。五年内编写了四部书和四篇文章，分别刊登《中国近代史资料》和《历史教学》杂志。

1958年8月，我从“历史三所”调到武昌中国科学院中南分院图书馆工作。1960年4月，又调到湖北科技大学图书馆工作。1961年湖北科大撤销，随之组织关系转到中国科学院中南分院武汉办

事处（以下简称“武办”）。这时我一面修订1958年增订的《综录》，一面校补张国淦遗稿《中国方志考》。为了充实书稿内容，提高质量，我曾数次自费到北京、南京、上海、宁波、合肥等地，调查地方志资料。工作是有成绩的：《中国方志考》明代部分三十多册校补完毕；《综录》第二次增订稿于1976年主动交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天文史料整编组参考；该组利用它从各图书馆所藏地方志中找到大量天文资料，编写《中国天象记录总表》和《中国天文史料汇编》。另外，又在这个基础上、更改体例、充实内容、编写了《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著录中国地方志约八千多部。

文化大革命中，对我个人来说、损失比较大的，不是一连串的“棍子”、“帽子”给予的肉体上和精神上的折磨，而是几十年积累起来的中外图书和一部分手稿、悉数被抄、被毁，没有留下一点踪影，影响了研究工作的顺利进行。临时放在家里正在进行校补的张国淦遗稿一百册（这部稿子是张国淦半个世纪以来辛勤劳动的成果，很有参考价值），连片纸只字都找不到了。这不能说不是中国史学界、地理学界的一个损失！

1969年下半年，我在沙洋“湖北省五七干校”。1972年该校领导让我回武昌家中休息，听候分配工作。回家后、看书学习、从不间断、主要研究地方志。从1971年起到1975年8月，我四次主动要求“湖北省五七干校”和湖北省委组织部分配工作，以便发挥专长，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但都没有回信。在这种情况下，我仍坚持学习，自信总有一天会争取组织信任，给予分配合适工作的。

1975年7月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两位同志来到湖北省图书馆查阅地方志中天文资料，正好我也在这里看书。经馆员介绍，我和他（她）们谈话。他们了解我愿把晚年献给社会主义建设事

业，回原单位向领导请示，经湖北省委组织部和湖北省五七干校批准，把我借调来京工作。革命青春，重新焕发，是从这时开始的。我高兴地看到我先后参加编写的《中国天象记录总表》、《中国天文史料汇编》和《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都将定稿出版，供广大科学工作者参考。“四人帮”粉碎后，我的革命干劲更大了。1978年春节前夕，我应邀参加了中国科学院北京地区各单位评奖大会。北京天文台天文史料整编组被评为先进集体；我也获得先进个人的光荣称号。科学大会也肯定了这个小组的成绩，颁发了奖状，给我以莫大的教育、鼓舞和鞭策。这是党和群众教育培养我的结果。

1979年，我在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领导下参加《方志学论丛》的编写工作。该书所选论文七十多篇，大致从1670年起至1979年止；其第一辑，二十多篇，将于1980年10月定稿。从这部书，可以了解地方志历史的发展、体例的演变、史料的价值及其各派学说的争论。这些对于整理、研究和编修地方志，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1979年上半年，接湖北省统战部通知说：经湖北省委批准，任命我为湖北省文史馆副馆长。同年年底，我被选为湖北省政协委员。这是组织上的关怀和信任，我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的水平低、能力差，工作中虽然取得一些成绩，但是离党和人民的要求很远。今后，更应在党的领导下，加强学习、努力工作，把晚年全部贡献给四化建设，为把我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努力奋斗！

著 述 简 目

一、 图 书 类

1. 中国地方志总录 三册 1935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著录全国各图书馆所藏方

志5832部，1958年增订再版 一册 著录7413部。

英国李约瑟所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第五卷“地学”曾称引《综录》及我所写的其他方志论文。

日本某出版社曾把《综录》影印出来。日本福井保著有《宋氏中国地方志综录补订》，载《书志学》复刊新十六号，1969年7月。日本《东洋文库地方志目录序》也提到《综录》。

2. 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地方志目录 一册 1942年美国政府印刷局出版 著录中国地方志2939部。（《补编》闻已编印，著录约四百部。）
3. 美国迫害华工史料 一册 1958年 北京中华书局出版。
4. 十九世纪美国侵华档案资料选辑 二册 1959年 北京中华书局出版。
5. 宋元方志传记索引 一册 1963年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
6. 官书局书目汇编 一册 1933年 北京中华图书馆协会铅印本。

参加集体编写的著述有：

1. 中国地震资料年表 二册 1956年科学出版社出版。
2. 中国天象记录总表 初稿 即将出版。
3. 中国天文史料汇编 初稿 即将出版。
4. 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 即将出版。

二、 论 文 类

1. 方志之名称与种类 禹贡半月刊一卷二期。
2. 明代四裔书目 禹贡半月刊三卷四期。
3. 杨守敬地理著述考 禹贡半月刊四卷一期。
4. 怎样编写新式的县志 禹贡半月刊七卷一至三期。
5. 临安三志考 燕京学报第二十期。
6. 宋临安三志版本考 文澜学报三卷一期。
7. 宋元方志考 地学杂志 民国二十四年二至四期。
8. 中国地方志统计表 史学年报一卷四期。
9. 华阳国志版本考略 燕京大学图书馆报七十至七十一期。
10. 翻刻孤本方志刍议 天津大公报史地周刊八十一期 民国二十五年四月十七日。
11. 整理研究地方志刍议 情况与建议第五十二期 1978年5月。
12. 关于调查和整理中美关系档案资料的建议 史学史资料第一期 1979年3月。
13. 中国地方志的起源特征及其史料价值 史学史资料第二期 1979年5月

(转载:湖南省志编纂情况简报第二期 1979年10月)。

14. 中国地方志浅说 文献丛刊第一辑 1979年12月。

三、留美期间(1939年9月—1949年)发表的文章(英文)

1. 道光皇帝致美国总统奏书(说明) 美国哈佛大学亚细亚研究季刊(约1942年)。
2. 对日本飞机疯狂轰炸我国金华提出强烈抗议 纽约时报(约1944年)。
3. 美国国家档案馆所藏中文档案资料 远东季刊 1949年。
4. 章学诚对于中国方志学的贡献 约三百页, 1946年写, 胶卷在美国密西根大学。

《历史档案》创刊

由中国第一、第二历史档案馆主编, 将于一九八一年二月出版发行的《历史档案》(季刊), 是我国目前唯一以公布历史档案文件为主的资料性、学术性兼顾知识性的刊物。它将为文史研究工作者、国内外历史档案管理机构 and 各级档案馆、大专院校师生等提供大量的原始材料。创刊号将原文公布: 明与后金大凌河城之战、太平天国天京事变与石达开出走、鲁迅主张废止袁世凯所定《教育纲要》的签注、吉鸿昌给冯玉祥的信、冯玉祥为营救“七君子”与蒋介石的往来密电、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辑、翦伯赞复冯玉祥的信等文电。并刊载曾三、郑天挺、荣孟源、彭明等专家学者的研究论文。内容丰富、史料新鲜, 目前已开始征求订户。

(徐艺圃)